

巴以冲突持续升级背后的较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钮松

连日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流血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巴以“火药桶”的引爆也牵动中东各国敏感神经,本轮冲突会否诱发新的地区战争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什么?双方各自有哪些诉求和目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本期论坛特请专家为您详细解读。



钮松

2 哈马斯扛起反以“大旗”

问:与以往相比,这次巴以冲突有什么特点?

答:巴勒斯坦并非铁板一块,内部的分裂固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在地理上的互不接壤是巴勒斯坦迈向建国之路的先天的不足,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法塔赫)的激烈对峙与这种地理上的隔绝不幸重合。与法塔赫基于世俗民族主义,谋求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与以色列毗邻而居不同的是,哈马斯实际上秉持的是一条宗教民族主义的路线。

宗教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的兴起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催生的产物。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完全占据了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包括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士兵出现在哭墙的画面刺激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埃及前总统纳赛尔高举的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开始走向衰微,宗教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蔓延。

1987年,哈马斯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中兴起,并接过了武力反抗以色列的大旗。集宗教性与政治性于一体的哈马斯坚守消灭以色列、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的目标,与以色列水火

不容,与法塔赫甚至发生暴力摩擦,形成了特殊的“三角”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对阿拉伯国家关系上的新突破,一定程度上使得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内部获得了新的拥趸。

与哈马斯高举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大旗不同的是,“铁穹”拦截大量哈马斯“土法”火箭弹的“烟花”淋漓尽致展现了以色列的军事技术民族主义。

以色列内部政治思潮多元,政党林立,甚至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也有着对立的看法。以色列通过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来塑造民族与国家认同,军事技术民族主义便是主要手段。以色列一直处在“失败就要灭亡”的巨大生存焦虑之中,“强而不安”的安全困境促使它在发展军事技术上不遗余力,并成为技术领域军民融合的典范,这也成为以色列国家认同与安全自信的重要保障。

“铁穹”系统是以色列为应对哈马斯经年累月的“土法”火箭弹越境袭击而“量身打造”的,成为维护以色列国土安全的利器。与以色列强大的军事技术实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存在巨大技术短板的哈马斯则以“政治大旗”为主要武器,双方呈现出默契的对垒局面。

1 双方都打“耶路撒冷牌”

问:本次巴以发生流血冲突的导火索是什么?

答:当前新一轮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2014年加沙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冲突。近年来较大规模巴以冲突的主角都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由于哈马斯独踞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分庭抗礼,因而巴以冲突从地理上主要是加沙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尽管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边境地区的热战不断,尤其是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和定点清除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并酿成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但回溯此次巴以冲突的源头,导火索是老生常谈的耶路撒冷问题。具体而言,以色列试图在东耶路撒冷谢赫贾拉地区扩建犹太定居

点,以及斋月期间对穆斯林前往阿克萨清真寺等圣地礼拜进行限制甚至驱赶,为早已剑拔弩张的耶路撒冷局势投射了新的火苗。耶路撒冷的“风吹草动”,毫无悬念地引来了加沙地区的“疾风骤雨”。尽管以色列与哈马斯间的立场相去甚远,但此次冲突中都在娴熟地打“耶路撒冷牌”,可谓双方难得的“默契”。

如果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根源性问题,那么耶路撒冷问题则是巴勒斯坦问题乃至中东和平进程的“梗阻”所在,这与耶路撒冷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特殊地位有着密切关联。

首先,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共有圣地的地位难以撼动。其次,耶路撒冷是主权争议之地,巴以之间围绕耶路撒冷特别是东耶路撒冷的

主权归属存在巨大分歧。

宗教圣地拥有对国际关系的独特影响路径。首先是耶路撒冷的“领土化”与国界争端。以色列、巴勒斯坦与约旦围绕耶路撒冷的争夺便是典型案例,有关各方难以在圣地的主权归属上达成妥协。其次是耶路撒冷的“首都化”与外交争端。以色列单方面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耶路撒冷为首都地位,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特朗普政府的迁馆举措使得耶路撒冷“首都化”问题在美国的鼓动下日益复杂,极大增加了巴以之间达成和解的难度。

正因如此,巴以冲突各方往往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各取所需并大做文章,以推进自身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上的发言中,特意强调“维护和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的历史现状”,便是对冲突双方的积极回应。

问:这次巴以冲突会不会上升为全面战争?

答:尽管巴以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已经常态化,但这些长年累月的小冲突在特定的时间节点陡然升级为大规模冲突乃至战争,亦绝非偶然之事。本次冲突的规模升级、迈向有限战争和最后的适可而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哈马斯与以色列政府的主动为之。

当前中东热点问题丛生,域外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博弈与插手更激化了原有矛盾,甚至制造了新的热点问题。“阿拉伯之春”以来旷日持久的也门战争、叙利亚战争和利比亚战争,都充满了明显的“代理人战争”印记,那些退居幕后的大小“操盘手”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冲突与战争的烈度与走势。

与其他中东热点问题所不同的是,不论是哈马斯还是以色列,尽管在中东国际关系中有盟友支持,但并未能削弱各自的自主性。

3 只能是一场有限战争

正因如此,哈马斯与以色列才能在巴以冲突的规模管控中形成合谋且游刃有余,冲突被牢牢约束在有限战争的框架之内。

就哈马斯而言,虽然基于反以共识而得到伊朗方面的强力支持,但仍与伊朗保持着适当距离。这既与哈马斯与伊朗之间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分野有一定的关系,更来自于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上的自主意识。

不论是主导巴勒斯坦政府的法塔赫,还是外国盟友伊朗,都难以影响哈马斯与以色列互动的节奏与强度。

虽然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是最为重要的盟友,这种盟友关系最终演进为美以特殊关系。由于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以色列利用美国的偏袒态度而自主发挥,甚

至对美施压。如这次冲突中以色列执意炸毁美联社驻加沙大楼,拜登政府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在此轮巴以冲突中,巴以双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哈马斯对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以保障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投票权利为由,推迟原定本月开始的全面大选极度不满,借以色列当前在耶路撒冷的一些举措引发摩擦之机,展开了对以色列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内塔尼亚胡总理在面临两年内第四次大选的组阁失败且伊朗核协议谈判进入关键期的时刻,需要一场对哈马斯的“秀肌肉”行动来为自己加分。

不论对于哈马斯还是内塔尼亚胡而言,双方之间的冲突绝非最后的摊牌而只能是一场有限战争,战争外衣下实质上仍是一场政治仗。

菅义伟会因东京奥运赌上政治前途吗?



王广 副研究员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近一段时期,随着日本国内新一轮疫情的反弹,已经推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又增加了不少变数。受到变异病毒持续扩散的影响,目前日本日均新增感染人数一直维持在5000人以上。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只剩两个月的时间,疫情肆虐下的日本,能否如期、安全地举办奥运会备受瞩目。

日本民众已集体麻木

进入4月份以来,日本国内新冠感染者数量开始增加。日本政府4月25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截止日期暂定为5月11日,适用于东京

都、大阪府、兵库县、京都府。最近,日本政府又再度扩大紧急事态宣言的适用对象范围,并延长宣言的截止日期。这次波及范围广、持续周期长的紧急事态宣言能否有效遏制疫情的扩散,成为两个月后东京奥运会能否举办的关键。

这是日本政府自新冠疫情以来第三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但要求民众减少出行、经营场所缩短营业时间等各种限制已经让日本民众陷入麻痹状态。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日本被视为“抗疫的优等生”,收获了国际社会的赞誉,“自律”“自肃”的文化也为这个国家赢得了不少赞许。但就是这样“自律”的民族也很难忍受此起彼伏的疫情反弹和三次紧急事态宣言。据统计,第三波紧急事态宣言期间,东京、大阪等地的街头、车站人流并无明显减少,可以说市民已经适应了紧急事态的节奏,令政府的防疫措施效果大打折扣。

本次紧急事态宣言虽然由中央政府宣布,但事实上却是地方自治

体积极推动的结果。紧急事态宣言发布之初,爱知县、北海道等没有被纳入实施范围的地方自治体就呼吁自主使用紧急事态宣言。

在涉及奥运会举办等问题上,中央与地方在多数时候意见并不统一。例如,承办东京奥运会部分赛事的埼玉县、静冈县等自治体明确表示,应该根据情况取消或推迟奥运会。在奥运圣火传递的过程中,部分自治体表示希望避开人群聚集较多的道路和公共场所。

三重压力下铤而走险

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的背景下,日本舆论越来越不看好东京奥运会。虽然日本政府目前仍然没有松口的迹象,不过面临的压力却在不断增加,这些压力主要来自舆论、专家和政治三个方面。

从舆论层面来看,根据日本共同社本月15日至16日的调查结果,有59%的受访者中希望中止奥运会,而支持举办的受访者中有25%希望空场举行。考虑到当前日

本较低的疫苗接种率,受访者普遍担忧变异病毒的传播以及疫情再度大规模暴发。在大多数民众普遍反对的状况下,日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声音,例如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早先表示如果疫情持续恶化,东京奥运会中止也是选项之一。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原定于本月17日访问日本并参加在广岛举行的圣火传递仪式,也因为本轮紧急事态宣言为由推迟访问。

从专业层面来看,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状况下,东京奥运会举办与否不应该服从于政治需要,而应该基于专业人员的判断。以本次紧急事态宣言为例,专家在对象区域的划定、具体执行的执行等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何将抗击疫情与举办奥运会有效接轨,日本政府内部可谓一团糟。例如,直接负责东京奥运会议题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菅义伟内阁奥运大臣九川朱代和日本奥委会主席桥本圣子不甚关心疫情应对,负责疫情应对的菅义伟内阁成员西村康稔、田村宪

久、河野太郎不顾奥运会。这就导致在新冠疫情应对和东京奥运会举办的问题上,政客们彼此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举办奥运,专家的意见往往被忽视,而政客们则出于个人利益只会虚与委蛇。

从政治层面来看,举办奥运会对于菅义伟内阁来说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应对新冠疫情、重振国内经济和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是菅义伟内阁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有着密切的关联,只有应对好疫情,才有经济的复苏以及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如今日本疫情前途未卜,如果执意举办东京奥运会,恐怕也未必能给日本经济带来积极效益,同时损失的还有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自民党将于今年9月进行总裁选举,而众议院大选在今年10月之前随时都有可能举行,届时遭殃的可能不只是菅义伟,还可能波及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席位。

新冠疫情肆虐、奥运迫在眉睫,留给日本政府的时间不多了。